

那又有甚麼用呢？故我要呼籲回歸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睿見，光只說一些漂亮的空話是沒用的，只有真正按着理念行事，由身邊做起，才能造成海峽兩岸的雙贏局面，並促進世界的和平。這就是我在《二十一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感言。

劉述先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講座

中國國民性問題

劉廣京

最近在溫習早年熟讀的兩部書。一部是亨丁頓的著作，認為中國歷史上災荒頻發對中國國民性有極大的影響；另一部出自雷海宗先生，他強調中國的武德與文德的意識足以影響行為與態度。今天，五六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國民性有沒有新生？

轉眼就是2001年1月1日，西方世界二十一世紀正式的道臨。這是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說法，所根據的是1582年羅馬教皇Gregory XIII關於如何計算公元世紀的詔示。但是陳方正先生於1999年12月在《二十一世紀》發表〈站在美好新世紀的門檻上〉，似認為2000年1月1日就進入新世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應與格林尼治天文台同具權威性。

林尼治天文台同具權威性。

我收到十周年紀念徵文時，恰巧正在溫習五六十年前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熟讀的兩部書。第一部是亨丁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原作，潘光旦先生譯述及整理的《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1929, 1933再版)；另一本是雷海宗先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40)。近來的讀者好像不太注意這兩部書。下文我想僅就這兩本書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論點，略作介紹。

劉廣京教授(右)與李遠哲教授(左)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會議上。



亨丁頓(潘光旦)的書注重中國歷史上的災荒，指出古史自《漢書》以來，便常說水旱災荒不數年便有一次，而且常常連年發生，殃及的地方甚廣。史書上留下的：「人相食，死者過半」，「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貧弱」，「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公開買賣年輕婦女歷來都有。亨丁頓(潘光旦)認為，中國歷史上嚴重災荒的頻仍發生對中國國民性有極大影響。歷經災荒的經驗而仍然生存且有子嗣的人，可以說是自私、自利而且可能是無情義的人(賣兒鬻女便是一例)。心軟而且不夠自私的人反而被淘汰了。亨丁頓(潘光旦)認為能夠適應災荒而生存的人具有吝嗇、心腸硬、自私自利等品性，也都成為中國國民性了。亨(潘)甚至認為這些品質不但在文化裏傳播，而且早就進入中國人的遺傳。他們說：「這種自私自利的品質，似乎也成了種族血統的一部分，深深的鑄在胚質裏面。可以說是種族遺傳的一部分，因為以前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這荒年的時候已經死完了。」

亨(潘)之論自私、自利等品性可經血統遺傳，這需要生物學家考察，我不敢輕信。但是以下所述雷海宗先生對中國國民性的看法則只認為文化上的價值意識，尤其是武德與文德的意識足以影響行為與態度。雷先生(筆者上大學時的業師)對西洋史和中國古史研究極其精湛，他論中國國民性是在抗戰期間有所感觸而發，所根據的是他對中國史一個基本看法——就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士都是文武雙全的國民兵；他們的行為是爽快的，心境是光明磊落的(雷先生最要學生看的史料就是《春秋左傳》與諸子書)。經過戰國而入前漢時代，徵兵制改為募兵制，士人的武德為文德所替代，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士專以心計取勝。整個文化精神因而日趨萎靡，有許多負面的國民性因而根深柢固。抗戰爆發，雷先生非常興奮。他在1938年底編成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裏面，有一段沉痛的話：

舊中國傳統的污濁、因循、苟且、僥倖、欺詐、陰險、小器、不徹底，以及一切類似的特徵，都是純粹文德的劣根性。一個民族或個人，既是軟弱無能以致無力自衛，當然不會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為直爽痛快不免與人發生磨擦，磨擦太多就不免動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來，動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只有專門使用心計了。處世為人，小則畏事，大則畏死，平日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謀私利。緊急關頭則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話來掩飾自己的怯弱。這種人格如何的可恥！這種人所創出的社會風氣如何的可鄙！

雷先生寫這段文字，是希望中國國民能夠在抗戰中忍受「一次澈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禮」而創造民族和文化的「新生」。今天，五六十年過去了，中國國民性有沒有新生？上面簡述亨丁頓(潘光旦)和雷海宗的說法，我想凡注意中國文化建設的人都應該注意到。

劉廣京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